



龙星初晖

清代宝星勋章图史

陈悦——著



双龙宝星勋章专著

揭开了晚清勋章的历史一角，
更掀开了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谲诡大幕

号角 Clarion 特辑

龙星初晖

清代宝星勋章图史

陈悦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星初晖:清代宝星勋章图史/陈悦著.--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594-3664-1

I.①龙… II.①陈… III.①勋章-史料-中国-清代-图集 IV.①TS934.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9459号

龙星初晖：清代宝星勋章图史

陈悦 著

责任编辑 王 青

特约编辑 王 菁

装帧设计 王 星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10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664-1

定 价 16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重要声明

本书有关晚清勋章的实物图片均来自各大博物馆、拍卖行或私人收藏。鉴于晚清勋章特殊性，编者和作者不对书中配图实物的真伪负责。相关图片仅供参考。

CONTENTS

目录

1

序一

4

序二

7

第一篇：宝星出世

53

第二篇：双龙降生

107

第三篇：光芒森射

149

第四篇：星越长空

180

附录 1：清代宝星勋章相关重要史料汇纂

205

附录 2：宝星大事记

262

后记

264

摘要

序一

欣闻国内知名军事历史作家陈悦先生即将推出新著《龙星初晖：清代宝星勋章图史》，很是感动。陈悦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海军史研究，成果颇丰，不曾想他在功勋荣誉制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

勋章及奖章一直以来被定义为军事领域的研究范畴，往往被其他领域忽视，而军事领域内，又鲜有人对这个题材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加之资料匮乏、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以及其比较复杂的政治、军事机密等门槛，导致这个领域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中国，勋章从严格意义上还算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军功、爵位、等级一直都是存在的。就勋赏制度而言，我国要早于外国约千年以上。“勋”字在古汉语中，有“特殊功劳”的含意，如《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说：“追思嘉勋，实不可忘”。据此含义，我国古代便实行着“勋官”制度。

“勋官”是中国古代授予有功之臣的荣誉性称号，最早可追溯到秦朝。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秦朝逐渐开始强大起来，最终扫灭六国，统一中国。在这次变法中，就有一项军事上的改革。为了鼓励杀敌求胜，秦朝就设立了军功爵禄制度，军功爵位制共分二十级，分别为：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大良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北魏时陆续置其官号。北周时对其进行了整理，正式设置勋官十一等，由上而下称为：上柱国、柱国大将军、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大都督、帅都督、都督。

此后，“勋官”制度一直为历代封建王朝沿用。正如《旧唐书》指出：“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阶爵之外，更为节级”。

隋朝初期，基本沿用北周的勋官制度，仅改“柱国大将军”为“柱国”，上开府仪同以下改“大将军”为“三司”。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更定官制，重改品级。废特进、八郎、八尉、十一等勋官，并取消朝议大夫。散、勋官合并，更改后的散职为从一品至第九品。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沿用周隋勋官制度，定勋官名称为：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骠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共十二等。最高者视正二品，最低者视从七品。贞观十一年，改上大将军为上护军，大将军为护军。唐朝的勋官以“转”相称，转数多者为贵。

宋朝的勋官等级仍为十二转，与唐代相同。京官和选人从武骑尉开始升转，朝官从骑都尉开始升转，逐级而进。骑都尉以上，两府和正任以上武臣遇到朝廷恩典，每次升转的等级，文、武朝官均升转一级。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罢文臣勋官，南宋又加以恢复。至元时，勋官减少为十阶，废云骑尉、武骑尉，并改品级为自正一品至从五品。除上柱国外，其余只用于分赠。明朝的勋官分为文勋、武勋十等。其中文勋十等为：左柱国、右柱国、柱国、正治上卿、正治卿、资治尹、资治少尹、赞治尹、赞治少尹、修正庶尹、协正庶尹。“自从五品以上，历再考，乃授予”。武勋十二等为：左柱国、右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骠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

到了清朝，因为清朝不等同于其他王朝，有很强的满族地方特色，再加之早期并没有像其他王朝那样在中原有过统治经验，清王朝入关问鼎中原后，勋级就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朝特色的爵位制度，

清朝爵位分为宗室爵位、蒙古爵位和异姓功臣爵位。乾隆十三年（1748）出台的《考试受封表》《钦定封爵表》确立了最终的封爵制度，宗室爵位分为十四等：一等曰和硕亲王，二等曰世子，三等曰多罗郡王，四等曰长子，五等曰多罗贝勒，六等曰固山贝子，七等曰奉恩镇国公，八等曰奉恩辅国公，九等曰不入八分镇国公，十等曰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等曰镇国将军，十二等曰辅国将军，十三等曰奉国将军，十四等曰奉恩将军。异姓功臣爵位又称“功臣世爵”“民世爵”，掌于吏部验封司，授予汉员和西南民族等满蒙外其他民族人士，分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等。此外，清朝还有授予“巴图鲁”勇号、赐给黄马褂、赐顶戴、赐花翎、赏紫禁城骑马、赏坐轿舆、赏用紫缰黄缰等勋奖。

虽然勋赏制度在我们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但以“勋章”的形式来表彰和标志特殊的功绩，则是外国人创设的。据《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记载：“十四至十六世纪，由君主设立的用于奖励贵族的宫廷勋章已经广为流行。”勋章作为一种奖励证章，最早在僧侣骑士团中实行。1348年英王爱德华三世设立嘉德勋章（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这可能是最早的勋章了。1399年英国又设立了巴斯勋章，1429年奥地利和西班牙设立金羊毛勋章，1522年瑞典设立宝剑勋章，1579年法国设立圣灵勋章等，这些皆属宫廷勋章。获得这种勋章的人可升为骑士，有贵族的权利。

中国政府颁发勋章的历史还要从近代开始。自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开始，我们封闭多年的国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我手上就收藏有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奖励给参与这次战争人员的奖章，而且奖章上还有“大沽战役”、“八里桥战役”等字样。还有法国政府颁发给参与这次远征人员的1860远征中国奖章，奖章正面是拿破仑三世的头像和中文“北京”字样的勋带，背面则刻有“PEKING 1860”等文字。

随着中外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一批握近代科学技术的“洋人”相继来到中国，在军队、企业、通讯、邮电、交通、运输和教育等部门服务。当他们的工作做出突出成绩，清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的奖赏。但按照大清的老传统，授予他们马褂、花翎、顶戴、赏食赏物等形式的奖赏，显然不够适宜的了。比如当年就是否赏赐给洋人吉必勋“巴图鲁”称号。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恭亲王奕訢就坚决反对，他认为“巴图鲁”勇号事关大清的“国体”，把一个洋人封为大清最高勇士称号“巴图鲁”十分不妥。大清开国至此，有此称号的也不过几十人而已，而且大多是满人，连汉人也不过十儿人。这才有了完颜崇厚后来的宝星勋章，用于专门奖给为大清事业作出一定功绩的洋人。双龙宝星勋章外形为星状，以龙为标志，以金银珠宝制作，价值昂贵。这也开启了中国勋章授予的历史。

虽然双龙宝星勋章是中国政府已知最早颁发的勋章，但其设计理念、设计过程、勋章样式、勋章种类、勋章等级和授勋人员始终没能厘清。陈悦先生的新著《龙星初晖：清代宝星勋章图史》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陈悦先生查阅了大量文献和图片资料，不但将宝星勋章的设计理念讲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图文并茂地将宝星勋章各个等级及颁发人员一一梳理清晰。尤其是对1908年宝星勋章改革后的等级、样式及包括载涛在内的国人获勋情况也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我弄清了很多以前经常在老照片上看到却一直没有捋顺的历

史细节。

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此法,国家先后颁发了八一勋章和友谊勋章。今后还将颁发七一勋章和共和国勋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翻开陈悦先生的这本《龙星初晖:清代宝星勋章图史》,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刘阳

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

代表作有《谁收藏了圆明园》

2019年3月20日于西直门素心书屋

序二

十九世纪下半叶，当中国人在近代化的浪潮冲击下睁开双眼看世界的时候，发轫于欧洲的勋章并未马上得到中国人的青睐。随着中国不得不敞开国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晚清政府和一些具有国际眼光的官员发现，中国传统的功勋荣誉制度与世界其他地方脱轨了。

于是，与当时整个中国的发展一样，多少带有一点迫不得已的味道，晚清政府前后经过几十年的摸索，逐渐建立起来了以双龙宝星为代表的真正的勋章体系。客观地说，以李鸿章、崇厚、曾纪泽为代表的晚清重臣，在推动中国功勋荣誉制度方面殚精竭虑，发挥了极其重要且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套体系，是近代中国在推动国家强盛和发展过程中做出的一大努力，不但带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通行的勋章体系接轨，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全世界所接纳，体现出了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面，晚清勋章只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尽管勋章并非源自中国，但它是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向全世界敞开胸怀，吸收借鉴并发展出自己独特体系的一个重要体现。从双龙宝星的设立和改革，到北洋时期对晚清勋章体系的继承，再到南京政府时期富有中华特色的勋章体系的建立，以及后来新中国对功勋荣誉制度的独特理解，直到当前国家对功勋荣誉制度的重视，勋章中国化的发展，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也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又一佐证。

对国人而言，勋章更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领域。由于中国本身缺乏勋章发展的土壤，因此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中国勋章的研究，国内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只有一些零星的文章予以介绍。普通国人更是根本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我们曾经拥有双龙宝星这种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勋章。

在长期从事勋章研究的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失衡的现状我们深有体会。尤其是在与国际勋章收藏和研究界的交流中，更是感觉我们对自己国家勋章认识的不足。以双龙宝星为例，早在其设立之初，德国的出版物就已经对其进行了介绍。而在当前国际收藏市场上，双龙宝星都是炙手可热的收藏对象，拍卖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在研究界，国外杂志会时不时发表有关中国勋章的文章，前几年也已经出版了有关双龙宝星的专著。

一百年前，先贤们不遗余力推动中国功勋荣誉制度近代化；一百年后，我们怎么能辜负他们的努力？其实早在开始研究勋章之始，我就萌生了制作出版一本有关双龙宝星专著的想法。但由于水平和精力有限，一直没法得以实现。后来因缘际会，号角工作室与《中华遗产》杂志合作，发表了一篇有关双龙宝星的文章。此后经过修改增加了不少内容又发表在了《号角文集》第一卷上。之后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合作出版的勋章专辑中，也有晚清勋章的内容。

出于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共同兴趣，我与陈悦先生多年前就已是好友。经过数年的交流，发现陈悦先生对中国勋章也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作为国内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饱满的学术热情让我非常折服。于是数年前就向其表达了请其撰写一本有关双龙宝星专著的想法。陈悦先生学术风范严格，他虽然答应了我的邀请，但进行了数年的准备，最终为大家奉上了这本填补国内空白的专著。

本书的价值毋庸多言，不但首次对晚清勋章制度的前后发展进行了严密的梳理，更是解答了许多历史上不曾被关注过的疑问。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悦先生赋有感染力的文笔为本书带来了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将与书中的主角双龙宝星一样，在相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回顾中国近现代勋章制度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在当前我国重新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设立并颁发了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并即将颁发七一勋章和共和国勋章的背景下，希望大众能够对曾被国人忽视了太多年的勋章报以关注，也希望勋章这一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能够获得勃勃生机。

唐思

指文号角工作室主编

2019年3月于深圳



宝星出世

第一篇



1. 英国设立的中国战争奖章，也被称作鸦片战争奖章。（供图/DNW）

2. 英国设立的第二次中国战争奖章，也被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奖章。（供图/Baldwin's）

一、“外国功牌”

两国出力员弁，即由臣飭令会防局仿照该国功牌式样，另铸金银等牌若干面，分别酌给佩戴，宣布皇仁，俾知感奋。——李鸿章：《奏奖外国官弁片》^①

在中国历史上，与军功、爵位以及勋奖等有关的制度，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非常遥远的古代，而把军功、爵位等直观地体现到外在服装配饰上的做法，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可以追考。最为著名的例子见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中，在雄壮的秦俑军列里，一些造型特殊的秦代将军俑上带有不同于寻常的特殊信息，这些陶俑护甲表面的一些数量、造型各异的彩带细节，可能就是记功或爵位的标记，非常引人注目。

中国本土原生的军功、勋奖形式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发展后，在19世纪遇到了一场巨大的变化。与当时中国国家和社会遭逢西力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一样，中国传统的勋奖形式也在这个时代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嬗变，受外来西洋勋奖模式的影响日深，最终渐渐汇入到诞生于欧洲的近现代勋章形式体系中。



注①：

《奏奖外国官弁片》，《李鸿章全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T1-11-017）。

3. 法国设立的1860远征中国奖章。(供图/DNW)



3

这一大变局的关键转折点，就在中西交往逐渐密切和正常化的19世纪中叶，即鸦片战争时代。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屈辱事件。列强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逼迫古老、自负的清王朝不得不放下她“天朝上国”的身段，俯下首去正视和承认自己已经被一个强大的西方所超越的事实。那段清王朝国门洞开的痛苦历史，如果换另外一种视角去观察，其实也是近代中国被迫放弃沿袭数千年的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国际秩序，去尝试适应、接受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法秩序的过程，这事实上也就是清王朝用近代国际法的形式和一系列西方国家正式建交的开始。

和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关系从对抗走向了华洋共处，清王朝很快便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一些因为种种缘故而为清政府驱使、服务的西方人，以及一些驻扎在中国的西方国家外交官，或为清王朝效力有功、驯

顺出力，或促进了中西交流，在弥合双方的矛盾分歧方面著有功劳，

乃至清王朝势必要给予其奖赏激励的程度。



当时清王朝的勋奖制度，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中国自古流传的形式，诸如封爵、晋官、授官、加级、授衔、授功牌、赐诰封等等，同时也还包括了一些带有清王朝自身特色的形式，诸如授予“巴图鲁”勇号、赐给黄马褂、赐顶戴、赐花翎、赏紫禁城骑马、赏坐轿舆、赏用紫缰黄缰、赏给香囊荷包、赏给衣料、赏给御笔字画、赏酒席等等，诸如此类。

总体上种类不可谓不丰富，而且具体的实践、运用的经验和成例也比比皆是，但是其中的一个巨大问题是，既往清王朝以这些形式所做的赏赐，都是针对本国的臣民，或是针对藩属国的人民。当面对本质上“非我族类”的西方人进行恩赏时，应该适用哪种奖励形式才较为合宜？是否还能用这些祖宗成法中的赏赐形式？在当时人的眼里，是个关系到国之礼仪的极费思量的大事。

传统的勋奖形式，大都是基于赏赐中国本国人这一基础而设定，如果直接拿来施加到洋人身上，似乎会发生于礼不符、于制不合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封爵、授官、赐勇号之类，更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文化、典章制度，显然必须要慎之又慎。倘若冒冒失失给洋人封上了中国的爵位、官职、勇号，显然会破坏传统制度，不仅洋人有可能借此炫耀、卖弄，甚至做出失控的无法

1





2

2.顶戴花翎，此为正五品。顶戴指代表官阶的顶珠，不同的顶珠材质和颜色代表不同品级，朝冠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用阴纹镂花金，九品为阳纹镂花金，无顶珠者无官品。在顶珠之下有一枝两寸长短的翎管，多用玉、翠、珉琅或花瓷制成，用以安插翎羽。翎羽又分花翎和蓝翎两种。花翎是带有“目晕”的孔雀翎，“目晕”又称为“眼”，在翎的尾端，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翎眼越多说明功勋越高。（供图/新加坡国际拍卖）



3

3.清代的黄马褂。此黄马褂为单褂，黄色实地纱制成。前后、左右四开裾，对襟五组直扣。马褂制作是最传统的满式工艺，马褂周身贴边，袖腋部分是从袖口过腋下直达前身底摆。手工缝纫，针脚细密匀称。

无天之事，而对国内臣民来说，似乎也不是很好交代，甚而会招来传统保守力量的猛烈抨击。

几经筹商磋商，清王朝最初挑选了一个以空对空的务虚之策，即用授予无关紧要的虚衔来作为奖励，给予有功的西方人以某种名义上的中国官职，但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相当于只是给洋人一种特别的荣誉称号而已。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国内太平天国战争仍然如火如荼。清王朝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一些中外官员的提议和联络下，开始借助还没有从中国离去的英法联军的力量，同时也开始接受俄罗斯等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而在太平天国战争的焦点地区，即江苏、浙江等地，还出现了直接受雇于当地政府的类似于洋团练的外国人雇佣部队。西方人由此大量、

1.参与筹办中外会防上海以及筹组常胜军的苏松太道吴熙。(拍摄/William Nassau Jocelyn)

密集地参与到了中国的国内事务中，而有关对西方人的勋奖形式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就在1860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了解天京之围，挥师向富庶的苏南地区发起猛烈的军事攻势，几乎是一瞬之间，苏州、常州、无锡等一连串江南名城，相继被太平军夺取，受此波及，对外通商口岸上海的形势也岌岌可危。时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吴熙等为了保住上海一隅的安全，一方面成立中外会防局，与在沪的英法联军协商，协调联军出动部分军队参与上海的防御作战；同时经上海著名的绅商杨坊等人建议和出资协助，在当年的6月份，以苏松团练局的名义，下令美国籍志愿者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组织招募一支包括有马来籍等外籍人士在内的雇佣军加入上海防战，因为这支雇佣军普遍装备西式武器，最初称为“洋枪队”，后来为了壮声威，称作“常胜洋枪队”，又更名“常胜军”。^①



注①：

《苏松团练局令华尔剿捕盗贼谕》，《吴熙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7页。